

13.0

南平文史資料

第十二輯

南平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南平文史資料

第十二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
南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

目 录

纪律·廉政·勤政——在夏道的回忆	刘光舟 (1)
忆南平广播收音站成立后的几件事	王鹤麟 (10)
记五十年代的省劳模黄金文.....	卢新泉 (17)
王台林业公社化记略.....	卢继勇 (24)
解放初期南平禁毒工作片断.....	吴立泉 (32)
南平五中的建立和发展.....	陈昌颖 (36)
宝珠山的私塾.....	卢世耀 (43)
省立高商学校在南平.....	谢华球 (52)
忆省立福州工业职业学校在西芹...	陈郑煊 (58)
解放前南平报业概述.....	卢元辉 刘立诚 (63)
南平照相业的发展概况.....	魏水生 (80)
南平燕春阳糕饼店.....	曹元斗 (90)
南平建兴清洁公司的兴衰.....	邹锡光 (93)

夏道公社五干部田塍滩遇险记……陈永长(99)

先祖陈守治先生往事闻见录……陈用苏(103)

纪廷洪传略……纪向良 吴文(120)

夏明钢事略……陈天绶(137)

1918—1920年王永泉混成旅在福建

延沙地区……陈长河(142)

纪律·廉政·勤政

——在夏道的回忆

刘 光 舟

我的青春是在五、六十年代度过的，而今已近“耳顺”之年了。我的一生是跟着新中国一起成长的，风雨同舟四十载，情感良深。回忆往事，最值得怀念的是五十年代的纪律、廉政和勤政。当年，干部不论大小都冠以“革命”二字，都有一种自尊、自爱、自重、自豪之感，也都有遵纪守法的自觉性。这是我们经常高唱的“革命干部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要注意”。在政治上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在经济上秋毫不沾，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在生活上艰苦朴素，以俭为荣；在工作上勤勤恳恳，不计报酬，确实做到政无不廉，干无不勤。我在九区（太平）、四区（夏道）工作期间，区乡村干部都能以身作则，扎实工作，勤政为民。干部只准一心为公，稍有

不规，如未请假回家、开会不作记录、工作怠慢，都要在各种生活会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我在太平、夏道工作七年间，只有一个干部违纪的，因男女关系被开除公职，遣送回乡劳动。对违纪的干部，真正做到严惩不贷，深得群众的理解和赞扬。群众说，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好在干部廉洁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干群关系亲如鱼水，没有听说共产党的干部有以权谋私的。贪污腐化、行贿受贿是群众诉旧社会苦，揭露国民党政府腐败的专用名词。当时，办事无需请客送礼，有钱也无处行贿。

五十年代，干部的好作风，应归功于南下干部带来的党的好传统，上梁正下梁自然正，我们这些建国初期参加工作的年青人，有幸与南下干部共事，得益良多。我所知道的县、区二级领导干部，不论县委书记、县长；区委书记或区长，均能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县委、县府各职能部门的部长、科长，以书记、县长为榜样，不敢逾越一步。生活艰苦朴素，一心埋在剿匪、反霸、土改、支前、抗美援朝、统购统销以及生产、互助、合作运动上，常年累月，风里来雨里去。县

委书记王桂芳、县长刘忠汉下乡到夏道，煮一碗面条算是盛情招待了。在南平，焦裕禄式的干部不是没有，他们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其实谈不上什么享受。从我初读过的二十四史里，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没有一个朝代政府官员比得上五十年代共产党的干部的。古代虽有包公，有海瑞，那只是被文人美化了的典型人物。建国初期干部的廉政勤政不是少数，也不是多数，而是一个群体的光辉形象。下面是我在夏道区工作期间的点滴回忆。

五天到岗

1954年3月底的一天，九区区委书记李纪鸿找我谈话，他说四区（夏道）区公所秘书詹济源要调到县委办公室工作，调我到四区公所接詹济源的班，在三天之内办好移交。当时调动干部象调动部队一样，没有商量的余地，说走就得走。我花了二天二夜把区公所的文书档案、枪枝弹药移交给郑家风。四月三日，我独自背一床被子，提一只参加革命时从家里带出来的藤箱，乘轮船到夏道区公所报到了，前后五天就到岗位了。

四区是全县除一区（城区）外，最大的一个区，有三万多人、二十个乡镇（包括现在夏道、炉下二乡镇，还有塔前、东坑等乡的部分村）。区公所地处夏道桥头（今为针织厂），是地主没收来的房子，四面高墙，我的办公室设在大厅的左房，有20平方米，一半是办公室，区公所唯一一间接待群众来访的办公室；一半是我的卧室，说确切只有一架床。到了新岗位，边熟悉情况，边开展工作，白天办理区上的公务，夜里到夏道镇发动群众参加高级社。那时农民渴望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憧憬着十五年实现社会主义，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生活。但是，一个又一个的运动，“左”的路线伤害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尽管如此，农民还是听党的话，坚信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勤政为民

解放初期，区委、区公所都不挂牌子，干部很少，区委五个干部，正副书记、秘书、组织委员、宣传委员。区公所十几个干部，正副区长、秘书、财粮、文教、公安、农会、支前等。每个

区干部包一个乡，除开会外，长驻乡里，吃派饭，每天交三角伙食费，日日交清。驻区干部只有二三人，书记、秘书、总务等。我当秘书，白天处理区里的公务，晚上还要到桥头村组织互助组、合作社，工作很繁重，一年到头除春节放几天假外，平时没有星期天，小节日也不放假。区委书记刘书木党性很强，励志勤业，干起工作不分昼夜，每项工作都力争先进，对县委布置的任务，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他文化水平不高，但脑子很精灵，抓工作认真细致，有理、有节，他的口才艺术，驰名区内外，善于编顺口溜。如“工作多汇报，一天一简报，小刘很辛苦，我们都知道。”他要求我每天向县委写一份简报，他讲大纲，我写文稿兼刻蜡纸、油印、寄发，偶尔也请陈永长效劳，每天都工作到晚上十一二点，加班了，也不加点。当时，干部少，工作并不少，最根本的一条靠纪律，各级干部都严明纪律，不允许干部存私心，谋私利，党员讲党纪，团员讲团纪，干部讲政纪，群众讲主人翁精神，干群一条心，党叫干啥就干啥。不团结、搞内耗的现象极少，每个干部埋头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干部年轻化

五十年代中期，大批南下干部先后从基层调到县里工作。区委除书记外，其余领导职务均由本地干部担任，年纪很轻。第四区除区委书记刘书木年近三十外，区长黄道极、副书记杨运樟，副区长陈凤春、戴家洲、陈名梓，都是二十几岁，我当副区长才二十二岁。这些干部论文化都不高，多数是中小学毕业。但建国初期，广大农村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就靠这批来自农家的子弟和回乡知识青年，他们没有家庭的牵挂，没有精神的污染，没有人际上的纠葛，他们为了革命相聚在一起，虔诚、纯洁、无私、厚道。干部与群众保持鱼水关系，与党保持高度的一致，县委说什么，区委传什么，干部事事照办，群众召之即来，干部言出必行，行之必果。无需上级检查工作，也没有“检查”这个惯例，几年没听说什么检查团到基层检查什么工作。当时，一个区包括党政军干部才十几个人，一个乡分不到一个干部，但我们的工作不感到困难，因为乡村政权很巩固，乡村干部很积极。合作化时期，会议很

多，不论远近都要步行，日里来夜里去，毫无怨言，就是乡村女干部也一样，冲破夜不离家旧俗，走出家门，走上社会，南平第一批十几个女干部如龚银英、谢长宜、欧淑英、邓秀琴、刘子英、蔡金华、陈珠琴等，都是从基层加入革命队伍的。

夜不闭户

夜不闭户当今人不可理解，在五十年代有户不闭并非谎言。当年，不仅干部遵纪守法，就是平民百姓也安分守纪。夏道是个集镇，交通方便，来往的人不少，但镇上的治安十分安定。区公所有二道门，围墙外的门从来不关的，院里的门也时常不闭，我在夏道工作四年，没有听说东西被盗的，各乡村也很少发生盗窃案。解放初期人民生活很清苦，为何社会风气甚好呢？因为，经过土改、反霸斗争后，在一个村里好人、坏人分得很清楚，好人不敢干坏事，尤其是贫下中农有强烈的主人翁精神，是革命的依靠对象。地富反坏分子在群众的严格监督下也不敢乱说乱动。盗窃、赌博都被看成是丑恶的行为，在群众的心目中象过街的老鼠。被公安局拘留过的人，回到

村将被列入四类分子的行列，有的受管制，有的受监督。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人民民主专政对社会治安确实发挥很大的作用，谁干了坏事，逃不出阶级斗争的惩罚——批斗。

一坛老酒

建国初期，干部吃喝只求温饱，不讲奢侈，干部和群众一样，不是年节不提壶，一年难得喝几次酒。那时，除春节外，其他的传统节日如端午节、七月十五日、八月中秋等讲排场的一套都认为是封建迷信被取消了。一年没有几个节，平时改善生活也不考究，吃喝不成风气。虽然，农村的商品也很丰富，山珍海味，如干贝、鱼翅、海参、鲍鱼等夏道供销社都有卖，价格也很便宜，一斤干贝三元多钱也无人问津，茅台、汾酒都是真货，青岛啤酒一瓶几角钱，有人嫌它有“马尿味”没人喝，汾酒出于山西，南平的山西干部很多；也不见他们喝家乡的酒，酗酒的人难以见到；平时，区公所是不备酒的。

1955年夏天，徐洋村有一个农业合作社修理谷仓（这房子是地主没收的），发现有一个地下

酒窖，有几十坛老酒，是这家地主解放前酿造的，土改时房屋没收了，没有交待地下是酒窖。这批陈年老酒呈朱砂色，芳香味甜，十分可口。区公所抬来一坛，其余由供销社收购，这坛老酒只有60市斤，在我房间里保管，半年多才喝完，区干部几乎没有人会喝酒，偶尔客人来了呷上几口。回想当年，不论南下干部或本地干部，他们绝大多数出身贫苦农家，都很自觉保持革命本色。谁要是讲究吃喝玩乐可能带来麻烦，甚至会被扣上“资产阶级思想”而影响入团、入党、提干。所以，穿草鞋、戴斗笠、衣衫褴褛，就是保持贫下中农的本色。相当部分的干部长期摆脱不了越穷越革命，以穷为荣的精神枷锁。我怀念的是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不是留念那清苦的岁月，那种“左”的思想路线要不得。

光阴似箭催人老，日月如梭遯少年。时间流逝的很快，不觉三十多年了，社会不断地发展，生活水平也不断地提高。但是，“五十年代精神”我想将会给人们不少有益的启示。

忆南平广播收音站 成立后的几件事

王 鹤 麟

为了加强抗美援朝的形势教育，发挥无线电广播新闻的作用，省委决定从全省各地市县各抽调两名具有初中文化程度以上青年干部集中在福州，由省人民广播电台负责培训后，作为各地广播收音站的收音员。培训时间一个月，经实际考验合格结业后，回到各地、市、县成立广播收音站并开展工作。1950年10月，我和俞辉同志从福建省人民广播电台收音员培训班学习结业回到南平，并从省台领回三架五灯收音机（一架直流收音机、两架交流收音机，在当时均属军事管制物资），立即筹建成立南平县广播收音站，工作人员只有两人，主要任务是：收听记录当天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福建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编印

出版南平广播新闻快报(全是油印的,连续出版236期)。在每日上午7时30分前分送给县委书记、宣传部长及有关单位抄写街头黑板报,向广大群众宣传。南平县广播收音站直接由县委宣传部领导,宣传部的通讯干事郭说传同志兼任收音站的站长。郭说传同志调省委机关工作以后,我调进县委宣传部当干事兼任收音站的站长,以后由俞辉同志接替。俞辉同志调华东局文化部工作后,收音站工作由陈淑修同志负责一段时间。

南平广播收音站的办公地址设在南平中山公园内的文化阅览室的底层,在两个小房间里,一间为宿舍,一间为办公室,在不到八平方米的办公室内,又分为记录新闻、刻印快报两个工作台。从每天记录新闻,编印快报到分发给有关领导和单位,我们两个人每天工作时,都是在16个小时左右,俞辉同志还经常带病坚持工作。

解放初期的南平,在群众中流传着:“南平南平、马路不平、电灯不明、消息不灵。”现在四十多岁以下的人,对当时的南平“消息不灵”是感受不到的。南平山城虽为闽北交通枢纽,但从省城福州送来的各种报刊,全靠船只,因为是

上水，一般要用三天左右的时间，因此要比省城的人迟三天看到报上的消息。南平广播新闻快报的出现，就能把中央和省城发布的最新消息当天和群众见面，从此改变了南平“消息不灵”的状况。

南平广播收音站成立时，是抗美援朝时期，这时，潜伏在南平城乡的匪特叫嚷什么“第三次世界大战快开始了”和“反攻大陆快要到来了。”潜伏城区的反共救国军曾密谋夺取广播收音站。当我们一收录到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取得胜利的喜讯时，马上编出号外，燃放鞭炮报喜。我们的喜炮刹下了潜伏匪特的反动气焰。县委书记秦定九同志表扬我们有主动出击精神。

南平县广播收音站开头只担负记录广播新闻编印南平广播新闻快报任务，到1951年7月因发展了有线广播，新闻快报便停刊了，从而完成了收音站的历史使命，变收音站为广播站。筹建有线广播，地委宣传部刘健夫部长对这项工作十分重视，亲自批拨专款给南平广播站购置有线广播的设备器材。当时，干部实行供给制，从安装机器到架设高音喇叭和电线，都是自己动手，加班

加点，没领取任何补贴费，相反地大家都把半年多为数不多的津贴费（即供给制干部的每日零用钱）倒贴进去，试播一个星期后，于1951年8月1日有线广播站正式开播。刘健夫同志曾亲到广播站播音室向城区人民宣讲抗美援朝的伟大意义，还请南平中学师生来播音室向城区人民教唱：“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和“捐献飞机、大炮打击美帝侵略者”等革命歌曲，在城区十来个大喇叭下，群众自动围在一起学唱革命歌曲。由于宣传发动工作做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促使全县各界人民踊跃捐献，成为全地区捐献飞机大炮，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斗争最好的县份。

当时南平广播站的办公室和播音室迁设在中山公园对面的一座平房里，在这座平房里有三个单位办公，一是南平广播站，二是中苏友协，三是南平专区文联。

南平有线广播在全地区算是最早筹建的，地委宣传部孙跃国、黄戴坤两同志总结南平经验后在全专区推广了。开头，南平广播站扩音器只有一套，白天开万人群众大会，我们把扩音器和关